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山东篇①

日前,“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我省的泰安大汶口遗址(新石器)、章丘城子崖遗址(新石器)、临淄齐国故城(两周)、曲阜鲁国故城(两周)、临沂银雀山汉墓(秦汉)、青州龙兴寺遗址(宋辽金元)等六项入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带你探秘这些悠久的遗址,寻找文明的源头。今天先来看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遗址和城子崖遗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

大汶口遗址,开启了文明的曙光

修铁路挖出震惊世界的遗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曾经采访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先生,他主持过多项重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是研究东夷文化的著名专家。他是山东先秦考古的开拓者。

据张学海先生介绍,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宁阳县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根据暴露于地面的彩陶片及其它遗物,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在大汶口两岸,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2—3米。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上千件,其中有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异常精美。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

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诞生了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大汶口文化(距今6200—4600年)。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遗址出土的墓葬、陶器及石斧、磨制骨器等生产工具,是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的重要线索,它将中华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了两三千年。



大汶口时期白陶单把杯



八角星纹豆

张学海说,大汶口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文化总体水平,在全国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名列前茅。首次考古发掘首先从大汶河南岸开始,后扩大至大汶河北岸的大汶口镇,面积达5400平方米,发掘出133座墓葬以及大量随葬品。出土的1000多件陶器中,有红、灰、黑、白各色陶器以及精美的彩陶。出土的石器、骨器也十分丰富,一部分玉器和象牙器,制作相当精细。

大汶口文化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山东地区,此后的几十年间,河南、江苏、安徽、辽宁等省相继有几千处同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世。考古学家将这一类

新石器时代文化统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将黄河下游史前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

自1959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现以来,共探明遗址区面积82万平方米,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1982年,大汶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进行保护。

曾被误认为是仰韶文化的遗物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其实,早在1952年,考古人员在当

时的滕县岗上村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片,但由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太具代表性,因此将其视为仰韶文化的遗物。1957年,考古人员又在山东安丘发掘出七座大汶口文化墓葬,由于出土遗物的面貌同龙山文化较为接近,因此将其归之于龙山文化的范畴。直到大汶口遗址出土了大量丰富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资料,才使得大汶口文化被世人所认识。

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层位上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利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碳14测年数据,夏鼐把大

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4300—2300年之间。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先后研究了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认为与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存在密切关系。

将中华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两三千

大汶口文化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展示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无文字历史的史前文明向有文字历史的文明社会转变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意义重大。大汶口遗址的发掘,颠覆了人们对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耕锄已经成为东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形式,这时的生活和生产工具均已专门化、定型化。今天,人们所用的镰、锄、铲、镰,便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发明,只是由原来的石器变成了铁器。此外,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还刻有“太极”图案。

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指出,大汶口文化时期是重要的时间节点,继夏商周断代史研究证明中华文明3000年后,大汶口遗址的发现,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提供了实物证据,将中华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了两三千年。

城子崖遗址,推翻了文化西来说

吴金鼎六次考察发现“龙山文化”

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字禹铭,生于1901年,山东安丘人。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1928年在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存。

1927年吴金鼎离开清华,返回齐鲁大学任教。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他对山东章丘县龙山镇2.5公里处的城子崖文化遗址发生了兴趣,曾六次前往考察,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30年,在城子崖遗址内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发现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推动作用。

1934年出版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部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根源之谜,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并得到了公认,为确立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三城叠压”震惊了考古界

1990年,曾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学海先生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一年3月16日,复探先从遗址的东沿与西沿下手,当天上午,在残垣西坡根的“生土”下发现夯土,距地表深达4米,夯土痕迹向南北延伸。经过三天的追踪,终于发现夯土围绕遗址,深2.5米至5米,以夯土外沿计算,面积约20万平方米,龙山文化堆积全在其内,其外不见,显然这是城子崖遗址下层的城基。

经过考古人员的试掘,在城垣的多个方位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城垣互相叠压的地层现象。原来复探探出的下层城垣遗迹,并不是一座城,而是分属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两座城。城子崖遗址是三个历史时期的城址,三者形制一致,城垣互相叠压。

下层是龙山文化城址。修筑城垣采用了堆筑方法,也就是边堆土边夯的方法,也采用了版筑法。一般在外侧取土,取土沟就成为城壕,城壕内壁和城垣外壁成一体,加高了城垣外壁的高度。城子崖龙山城是一种台城,即城内地平面高于城外,只有南北两门,城门门道不在城垣缺口处而在缺口外方,筑了缓坡形门道,南门门道西沿发现墙和房址,可能是门卫房。这是全国首次认识这种史前台城,对后来确定龙山时代的城产生了重要影响。

城子崖遗址(距今4500年—4100年)是龙山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位于济南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东北,是山东最早发掘的史前遗址。1928年,城子崖遗址被吴金鼎发现。经上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考古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多项第一,被誉为中国的“考古圣地”。



▲ 龙山文化蛋壳陶杯
▼ 龙山文化黑陶双系壶



岳石文化城是在龙山城的基础上修筑的,大多是贴龙山城垣内侧修筑,后又贴先筑的岳石文化城垣内侧修筑,城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都有基槽,全采用原始版筑,使用成把的小棍夯筑,夯土层面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夯窝。

上层是周代城,即《城子崖》中所说的灰陶文化时期,确切地说基本上是春秋城,不是商周城。尽管此城的修筑是在岳石文化城废弃很久以后,但城垣仍在岳石文化城垣的基础上修筑。春秋城的地面高于现今遗址地面,地面城垣已基本不存,地下墙基也很不完整。

张学海曾经回忆说,试掘证明龙山文化人乘此居住时就开始建城,但并无龙山文化城以前的龙山文化堆积。而且龙山文化城主要是用堆积法筑成的,夯筑技术比较原始,而岳石文化城是版筑的,两者城垣的夯土结构迥然有别。因此,证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是岳石文化城,而不是龙山文化城。龙山文化城是这次的新发现,同时对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作出修正,确认是春秋城而非商周城。两大悬案都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是城子崖考古和龙山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蛋壳黑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最高水平

城子崖遗址总面积为20万平方米,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

少量铜器,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实证。

自城子崖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龙山文化后来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距今4000多年,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考古人员对蛋壳陶的评价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蛋壳黑陶杯,就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器的典型代表,它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城子崖遗址是国家学术机构、考古学者自主发现并发掘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城子崖发掘为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推翻了文化西来说,城子崖遗址因此获得“考古圣地”的殊荣。它的发掘,在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1年3月4日,城子崖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城子崖遗址考古新成果荣获1990年度和“七五”双十大考古发现;2008年,城子崖遗址被列为“十一五”期间全国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之一;2017年12月2日,城子崖遗址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